

抗战时期王亚南在粤北的《资本论》教学实践与当代价值

韩爱芬 王海龙*

韶关学院 广东 韶关 512000

【摘要】：抗战时期，王亚南在粤北中山大学任教期间，通过《资本论》教学，成功创建了一套根植于中国战时实践的教学体系：在内容上，以战时中国经济现象激活经典理论；在方法上，通过墙报、学术杂志、小组研究、社会调查等方式，打破课堂界限，形成“自学唱戏，共学搭台”的教学模式；在视野上，提出分科研究构想，体现了创立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自觉。这一教学体系不仅培养了一批杰出的学术人才，更孕育了《中国经济原论》这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奠基性学术成果，对推动当代经济学课程改革、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王亚南；《资本论》；教学体系创新；经济学中国化；自主知识体系

DOI:10.12417/2982-3803.25.12.005

王亚南是《资本论》三卷本中文全译本的翻译者之一，1940年至1944年期间在粤北坪石国立中山大学任教，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开创者，为《资本论》中国化作出了重大贡献。现有关于王亚南的研究，多关注其《资本论》的译本价值或理论贡献，对其教学研究不多，即使有也多集中在王亚南主政厦门大学期间，而对其战时教学实践的系统探讨存在明显薄弱。本文通过梳理王亚南抗战时期在粤北的《资本论》教学创新、实施路径及历史影响，以探讨其当代价值。

1 王亚南《资本论》教学的课程定位

“爱国”是王亚南事业进步的不竭动力。如何用《资本论》来解决中国经济问题，是王亚南《资本论》教学活动的根本指针。这种“理论服务于社会变革”的课程定位，与当时大学讲坛上普遍存在的、脱离中国实际的“奥地利学派”形成鲜明对比。

抗战时期，粤北相对宽松的学术生态也为王亚南这一教学实践提供了可能。全面抗战爆发后，由于国共合作，无论是广东当局还是校方都比较“开明”，求真务实、教育救国之风遍布于中大校园，这为王亚南教学实践提供了肥沃土壤。

2 王亚南《资本论》教学内容、方法及学科创新

在粤北相对宽松、充满思辨的学术环境中，王亚南通过一系列富有创新性的《资本论》教学实践活动，来帮助自己实现变革中国社会的宏大愿景。

2.1 课程内容的战时转化

王亚南坚决反对照搬西方经济学教材，探索出了一条“以中国战时经济激活经典理论”的本土化路径。在给高年级同学上经济学课时，开始他以李嘉图的《经济学及赋税之原理》作为教材，但发现很多同学对这门课程并不感兴趣。经过深入思考和自我检讨，他在1941年调整教学思路：先讲李嘉图理论，然后用它来说明中国战时经济现象，而后再比较两者异同，以确认中国经济的非资本主义属性。这一转变立刻吸引了学生，大教室座无虚席，有时门口和窗台都挤满了旁听者。

1942至1944年，王亚南索性直接从《资本论》一般理论着手，通过逐项对比，进而深入分析中国经济形态与《资本论》一般经济形态的异同，而且还会就社会上流行的一些混淆视听的不正确观点分别给予解释说明，令学生耳目一新。他的教学愈来愈具有吸引力，他因此声名远扬，许多衡阳、韶关等地的青年也专程前来听课。面对战时物价飞涨等现实困境，1943年1月，王亚南就《当前的物价与物价管制问题》在中大研究院做演讲。这是当时结合中国实际，运用《资本论》分析战时通胀根本原因并寻求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典范。

2.2 “自学唱戏，共学搭台”的教学模式

为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王亚南不仅对教学内容进行了本土化创新，还创造出了一套“自学唱戏，共学搭台”的教学模式。他重视自主学习，认为：“自己找来的东西，自己消化了的东西，往往是最有益于自己的。”^[1]即将与中大师生告别

作者简介：韩爱芬（1973.10-），女，河北邢台人，韶关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教育。

通讯作者简介：王海龙（1981.07-），男，吉林龙井人，韶关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副院长、法学博士，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理论与实践。

本文系韶关学院2023年度校级人文社科类重点科研项目“粤北红色文化资源有效融入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研究”（项目编号：SZ2023SK01）研究成果之一。

时,他写信寄望中山大学经济系的全体同学,希望他们在大学里能够利用学校提供的各种条件,自己去寻找知识,自己去理解消化知识,做一个真正的大学生,不辜负青春年华。那么怎样才能调动学生的自学积极性呢?王亚南认为:

第一,要保持开放包容的治学态度,这是自学获取真理的重要前提。王亚南是一个胸怀坦荡、讲究原则的人。他认为做学问既要有开明的研究态度,也要有坚定的研究立场,二者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不可偏废。他认为真正的学术自由诞生于相互尊重、彼此给予自由表达的过程之中。当有人提出怀疑时,他说两者并不矛盾,而且会互相促进。他进而表示,真正的学说是怕质疑和非难的,也只有在相反学说的质疑非难中才能不断检视自身、才能不断发展完善并散发出真理的光辉,也就是真理非辩不明,真金需要火炼。他强调在研究中应“从反对者获取自由,予反对者以自由”^[2]。

第二,要探寻适合自身的学习方法。王亚南向中大学生推荐“比较”学习法:在经济学学习中,研读某家的理论时,可参阅其他各家的理论,看谁最合理、最科学,然后再进一步对各家理论进行比较。他指出这种学习方法虽然有流于形式主义的危险,但是当对社会科学基本法则和方法论形成一定认识后,这种研究方法就最能开拓自学视野、提升自学能力。

第三,要重视共学的互补价值。王亚南懂得“独学则无友,孤陋则寡闻”的道理,他经常劝导并鼓励同学们要互相结合、彼此切磋,并把这称为“共学”。他认为:在学习中,共学可以不断有人从旁“打气”,可以开阔眼界,可以弥补自学中物质条件的不足。并且指出,学伴儿是自学中最不可少的,不管多少,哪怕只有一个,也会让自己的学习获益匪浅。重要的是“这样的朋友的发现和获得,是要在自己努力学习进程中,才有可能;而且定要自己在那种进程中,才能感知其必要。”^[3]

特别值得推崇的是,王亚南在倡导共学的同时,还主动为师生搭建共学学习的平台。具体来说有三种表现形式:其一,创办墙报,构建“学术小天地”,每个同学都可畅所欲言,自由发表见解;其二,创办学术杂志,为学术争鸣提供阵地,王亚南创办《经济科学》杂志,为师生提供研究成果的发表平台,助力学生系统提升理论思维与学术研究能力;其三,分组开展研究,以集体智慧来解决现实难题,针对当时研究书籍短缺及利用率低的问题,王亚南根据学生兴趣,将研究分成八个小组,以小组为单位登记个人藏书,大家相互借阅、互通有无,成效明显。

这种“自学唱戏,共学搭台”的教学模式,没有止步在书斋内的讨论,王亚南依托调查研究,更将其进一步拓展至广阔的社会领域。在他的提议下,学校恢复了经济调查处,并由他担任主任。为了深入研究中国战时经济问题,他不畏艰苦,经

常组织经济系广大师生到粤北乃至湖南、广西等地,深入田野,进行农村经济、物价等社会调查,亲身感受社会经济发展脉搏,广泛收集经济学一手资料,针对现实经济问题进行分析,培养师生的责任和能力,让他们学以致用,来改造中国社会。

2.3 前瞻性学科体系探索:从教学实践到学科构想

1944年3月《经济科学》出版了“分科研究指导专号”,王亚南发表《关于经济科学分科研究指导》一文,文章对经济学分科研究的必要性进行了系统阐述,指出:经济科学包罗万象,而且也大有沦为经济技术训练的附庸,导致经济学理论研究缺乏必要的深度。为了“减少研究者注意不易集中,对所学无法深入的弊病”^[4],他主张依据研究者的个性和兴趣将经济学研究分为经济理论、经济技术、经济政策等八个小组,各小组分别就不同的方向进行深入研究。这一探索不仅从研究视角、方法和内容上深化了经济学研究,而且也为我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做了一次开拓性尝试。

3 王亚南《资本论》教学的成效与历史影响

粤北时期,王亚南摸索出的这套《资本论》教学体系,不仅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培养了一支优秀的后继人才队伍,而且还孕育出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奠基之作。

3.1 人才培养与学术传承

在中大期间,王亚南注重人才培养,特别关注有潜力的学生。例如,他重点培养涂西畴,并打破常规一次性选拔5名优秀毕业生留校工作;他力排众议聘请年轻的陶大镛担任讲师,且支持他前往桂林参加留英庚款考试。在王亚南的扶植下,陶大镛仅用三年时间,27岁就成为中大最年轻的教授之一。陶大镛回忆说:“我追随这位献身于真理的良师,学到了不少东西。我没有上过讲坛,他指导我备课;我缺乏科研修养,他激励我知难而进;我偏爱钻书本,他又提醒我重视实际。他学风严谨,一丝不苟,经常告诫我打开眼界,博览各个流派的学术著作。”^[5]字里行间充满着感激之情。粤北时期,王亚南培养了陈其人、袁镇岳、张来仪等一批具有广泛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与教育家,形成了《资本论》研究与传播的“坪石学派”雏形。

3.2 对《中国经济原论》的理论滋养

关于教学与研究的关系,王亚南认为,在某种意义上,“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就是科学研究的过程。”^[6]《中国经济原论》被业界誉为“中国版”《资本论》,是中国经济学的奠基之作,而它就是在粤北时期的《资本论》教学过程中孕育产生的。坪石课堂上,学生们对李嘉图经济学的冷漠反应,促使王亚对当时中国的经济学教育进行反思。他下定决心要编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教材,并称这个教材要特别符合中国人阅读的口味、要特别能激起中国人阅读的兴趣,尤其要特别能为中国

社会经济改造指明方向,同时它还要是一部有助于解除中国人思想束缚的政治经济学教材。在教学中,中大师生的不断“考问”更为他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思想灵感。在出版《中国经济原论》的序言中,王亚南表示,他的这一研究成果是中大经济系乃至全校致力于中国社会经济科学研究的同事与同学不断鼓励的结果,是在研究过程中中大师生不断提问、不断切磋,引发他不断思考的结果,是中大师生孜孜以求、不断探究真理的结果。经常置于被考试者的地位,让王亚南深刻理解到所谓“教育者在不断被教育”^[7]的意义,没有这一独特的经历也就不可能有《中国经济原论》的诞生。他在序言中特别强调:“这几年高等经济学的讲义,则大体是本书的主要构成部分。”^[8]离开粤北以后,学生根据其讲义整理汇编,最终促成了《中国经济原论》的出版。

4 王亚南《资本论》教学的当代启示

王亚南粤北时期的《资本论》教学成就,不仅有力证明了其教学理念的先进性和教学举措的科学性,而且对今天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建设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是要注重经济学教材的本土化创新,提高理论说服力。当前教材编写应打破思想桎梏,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

中的独创性经验与生动案例,进行扎实理论提炼后,有机融入教学体系,以强化理论认同与实践自觉。二是要坚持“问题导向”的教学逻辑,回应时代关切。当前政治经济学应聚焦“数字经济”“新质生产力”“共同富裕”等现实议题,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分析中国经济现象,让理论教学回应时代关切。三是要构建“教学—研究—实践”闭环,化解能力培养困境。高校可以此为鉴,围绕现实问题,组织学生开展学习研究调研,建立以学生为主体的探究式教学闭环,培养其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四是要创造性地重新构建学科体系,努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培养人才。中国经济学学科建设不应局限于在西方既有框架内简单嵌入中国案例,而应以整体性视野推动学科范式创新,创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

5 结语

抗战时期,王亚南在粤北的《资本论》教学探索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篇章。他在教学内容、方法与学科构想上的一系列创新性探索,不仅有效推动了《资本论》的传播与转化,更培养了一批扎根于中国实际的经济学人才。这一历史经验为当下推动经济学课程改革、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增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现实生命力,具有宝贵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 [1] 林间.霜叶红于二月花:王亚南、随笔书信集[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20:230.
- [2] 林间.霜叶红于二月花:王亚南随笔、书信集[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20:231.
- [3] 林间.霜叶红于二月花:王亚南随笔、书信集[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20:230.
- [4] 许瑞生.抗战时期华南教育历史论稿[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24:325.
- [5] 林坚.王亚南传[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21:125.
- [6] 林坚.王亚南传[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21:332.
- [7] 王亚南.中国经济原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5.
- [8] 王亚南.中国经济原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2.